

河岳英靈集研究



李珍華
傅璇琮
撰

中華書局

I207.22/558

河岳英靈研究

河岳英靈集研究

李珍華
璇琮撰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徐 俊

河岳英靈集研究

李珍華 傅璇琮 撰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8¹/₂印張·147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冊 定價：6.55 元

ISBN 7-101-00934-4/I·162

前記

本書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有關《河岳英靈集》及編選者殷璠的評論、考證，後一部分是《河岳英靈集》的整理點校。《河岳英靈集》是唐人所選唐詩的一種，但它不是一部尋常的詩歌選本，在中國詩歌史和文學理論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從文獻材料上說，由於它的選錄，保存了若干唐人的詩（其中如賀蘭進明、李嶷等好幾位詩人，《全唐詩》據《唐詩紀事》採錄，而《唐詩紀事》即直接採自《河岳英靈集》）。它的理論上的價值更加明顯。它所提出的與象說、音律說，鮮明地反映了盛唐時代詩歌高峰期的創作特色和理論特色。殷璠與王昌齡，是開元、天寶時期最具理論系統的詩論家。

但長時期來，這兩位詩論家的意義却得不到足夠的認識。原因在於研究不足。對於殷璠與王昌齡的研究，需要從理論探討與文獻整理兩方面入手，缺一不可。王昌齡，一般都單純地把他視為有特出成就的詩人，而忽略他還是很有系統的、極富理論色彩的詩論家，他的《詩格》長時期中被認為偽作，原因即在於沒有對《詩格》進行實實在在的清理。對於《河岳英靈集》的研究，這些年來有一定的進展，有幾位研究者作出了很好的成績。但以往的研究還只限於一個一個專題，而更大的遺憾是，對《河岳英靈集》本身缺乏認真的整理，以致長時期來沒有能為研究者提供一種較為信實可靠的本子。

殷璠所編的這部詩選，他自己說是兩卷，宋人的公私書目，也都作同樣的記載。但從明代開始，却都著錄成三卷，一些有名的刻書家，也按三卷本刻印，較早的兩卷本遂不爲人所知，以致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把它與鍾嶸《詩品》相並比，說鍾嶸《詩品》三卷分上中下三品，殷書既然也分爲三卷，當也同樣有抑揚之意。這就造成了評價上的極大的誤解。而在文獻整理上，自從三卷本流行，一般也就根據這三卷本來對詩人的作品進行文字上的校勘。本世紀五十年代，現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印了一部《唐人選唐詩》。這部書的印行曾起到材料普及的作用，對研究者帶來較大的方便。但也有很大的不足，即底本選擇不嚴，校勘不細，《搜玉小集》等幾種都有這種缺陷，而問題最大的則是《河岳英靈集》。編者不選擇較早的兩卷本，却選擇後起的三卷本（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刊本），書後雖附有臨毛斧季、何義門的校記，却又缺漏極多。而又因爲自五十年代以來就僅僅印行了這一部《唐人選唐詩》，於是研究者在作文獻整理時即據此作爲版本的依據。這裏不妨舉一個小例子。近年巴蜀書社出版了王仲鏞先生的《唐詩紀事校箋》，這是一部很見工力的著作。但王先生在據《河岳英靈集》校勘時，當即是據這部五十年代印行的本子。這樣，就往往出現這樣的情況，即在作異文校時，校記中說《河岳英靈集》與此不同，而作某某，但實際上宋刻本《河岳英靈集》恰恰不作某某，而同於所校的文字。近代印刷術的發達固然可以促使古籍的流通，但如果採擇不當，工作做得不細，也反而可能以次品當真品，從而給文獻整理帶來更大的不便。

鑒於以上情況，我們遂決定對《河岳英靈集》本身進行正本正源的整理，希望恢復兩卷本之舊，並結合明代流傳的幾種本子，加以彙校。我們這樣做，是想為理論探討提供較為札實的材料基礎。同時也想表明，我們對於古代遺產的研究，確實需要對基礎工作的重視。我們對古代有代表性的著作，要一部書一部書進行清理和研究，做一項有一項的成績，使後來者能據此再向前進展，而不要仍遺留不少問題，使以後的研究者還不得不再回過頭來補正我們的遺誤。

前面的幾篇專文，有些曾在刊物上發表，這次作了若干改動。我們誠懇地等待讀者的批評。

一九九一年一月

DL 54/12

河岳英靈集研究目錄

前記……………(一)

唐人選唐詩與《河岳英靈集》……………(一)

盛唐詩風與殷璠詩論……………(七)

《河岳英靈集》音律說探索……………(七〇)

殷璠生平及《河岳英靈集》版本考……………(九八)

河岳英靈集(校點)……………(一二五)

〔附〕汲古閣刻本《河岳英靈集》何焯批語……………(二四九)

後記……………李珍華(二五五)

唐人選唐詩與《河岳英靈集》

《河岳英靈集》是專收盛唐詩的一部詩選，天寶後期丹陽殷璠編。在編選時，殷璠把他對同時代詩人的評論寫進這部《河岳英靈集》中，使這本詩選帶有文學批評的性質，而他的批評又牽涉到詩歌的藝術表現，詩歌的發展道路，以及內容與形式等具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問題，這就使他的批評又進入文學理論的範疇。但是《河岳英靈集》畢竟是詩歌選集，我們首先要把它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來考察。唐人編選本朝的詩歌，有它自身發展的軌迹。我們不妨循着這條軌迹，看看殷璠佔據着什麼樣的位置，他與其先行者相比，有否增加些什麼；與他以後的詩選家比較，他給予了什麼。在對他的詩歌批評與理論觀念進行具體的分析的同時，對唐人選唐詩的演進作一概括的考察，似也是合宜的。

殷璠以前的唐詩選本，據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集錄」所載，有《續古今詩苑英華集》、《麗則集》、《詩人秀句》、《古今詩人秀句》、《玉臺後集》、《正聲集》、《奇章集》、《搜玉集》、《國秀集》等九種。其實還應當加兩種，即《翰林學士集》和崔融編的《珠英學士集》。這十一種如《麗則集》、《奇章集》、《搜玉集》因不知編撰者姓名，其書早已亡佚^①，具體情況不得而詳，又如《珠英學士集》只記武則天時修《三教珠英》諸臣的詩，並無多大意義，其書也僅存殘本^②，這些都不可論。現在讓我們以確知其編撰者姓名，

並可以考知其書的，作一個較為系統的回顧，並以之與《河岳英靈集》作一些比較（《翰林學士集》有傳本，收唐太宗、許敬宗等人詩，當另論）。通過這一回顧，希望對於從唐初至玄宗時期的唐詩編選，以及中晚唐時期的某些有代表性的選本，有一個大致的瞭解。

唐代前期的唐詩編選，也同當時的詩歌創作一樣，受六朝詩風的影響。似乎到高宗、武則天時，一些詩歌選本在編選本朝詩時，還是與前朝（尤其是與南朝）一起合編，這反映了當時一些編者們的文學觀念，他們還沒有認識到唐詩的獨立價值。

現今所知唐代第一個唐詩選本，是出於長安的一個僧人所編，即釋慧淨的《續古今詩苑英華集》^①。與此同時，他的友人劉孝孫也編有一部類似的書，名《古今類聚詩苑》三十卷。但劉孝孫所編已經亡佚，而他為慧淨的書所寫的一篇序言却保存下來，由此使我們得以窺見慧淨編選的宗旨。

《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丁部集錄載《續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在另一處（丙部子錄釋氏類）著錄慧淨的另一部著作《雜心玄文》，並云：「姓房，隋國子博士徽遠從子。」關於慧淨的事跡，我們從《續高僧傳·卷三》的傳文中可以得知，他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士徽遠之侄。十四歲即出家，隋文帝、煬帝時就有聲譽。唐貞觀時為長安紀國寺主持，大臣房玄齡與結為法友。高宗李治為太子時，就曾請他主持普光寺。《全唐文·卷九〇》四所載慧淨《辭謝皇儲令知普光寺任啓》、《重上皇儲令知普光寺任謝啓》二文，即為此而作（《全唐文》據《續高僧傳》輯錄），皇儲即指李治。慧淨

卒於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年八十六。

《續古今詩苑英華集》已佚，我們只能從《續高僧傳》中所載劉孝孫《沙門慧淨英華序》瞭解其情況（也載於《全唐文》卷一五四）。這裏似應對劉孝孫作一些介紹。他的事跡附見於《舊唐書》卷七二《褚亮傳》後。《褚亮傳》中有一段話記敘唐太宗設文學館事：「始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及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學士。……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良值，宿於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州。」在這之後，即記劉孝孫事：

劉孝孫者，荊州人也。……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庾自

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爲文會。大業末沒于王世充。世充弟偽杞王辯引爲行臺郎中。洛陽平，辯面縛歸國，衆皆離散，孝孫猶攀授號，迨送遠郊，時人義之。武德初，歷廣州錄事參軍，太宗召爲秦府學士。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嘗採歷代文集，爲王撰《古今類聚詩苑》四十卷。

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參軍，尋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又《新唐書》卷一二〇《褚亮傳》載秦府十八學士原有薛收，貞觀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據《新唐書·藝文志》，他的著作尚有《儀實錄》一卷（屬乙部史錄儀注類），與房德懋合撰《事始》三卷（屬丙部子錄小說家類，當是《事物紀原》一類的書），又《隋開皇曆》一卷，《七曜雜術》一卷（屬曆算類）。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劉孝孫是在南朝的文學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與南朝一些著名文人如虞世南、庾抱、孔德紹一樣，經過隋朝的短促時期，因其學識和文才而得到新建立起來的唐朝的重視。他的詩現存七首，特色不多，但似乎已多少擺脫六朝綺艷文風的影響。如《咏笛》一首：「涼秋夜鳴笛，流風泳九成。調高時慷慨，曲變或淒清。征客懷離緒，鄰人思舊情。幸以知音顧，千載有高聲。」又如《早發成皋望河》：「清晨發岩邑，車馬走轅轅。回瞰黃河上，愴怵屢飛魂。……懷古空延佇，歎逝將何言。」（《全唐詩》卷三三）寫景抒情，行役懷古，已經向質朴方向發展。

《沙門慧淨詩英華序》開首稱頌慧淨於佛家教義涵養之深，後敘二人交誼：「予昔遊京輦，得伸敬慕。寥寥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閒居，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誘余以真如，挹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仰其峻極。」這是唐初士大夫與佛教徒交往的一段很好的材料，對研究僧人怎樣以佛學奧義來吸引文士，很有幫助。文章接着說：

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闍綺窗之咏，魏王北上，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日月，彭澤之攜微雨，遠乎顏、謝振藻，任、沈道文，足以理會八音，喜諧四始，咸遞相祖述，鬱為龜鏡。

從這段話中可以見出他們對建安至齊梁的詩歌有較廣泛的討論。接着說：

近世文人，才華間出。周武帝震彼雄圖，削平滄滄；隋高祖韞茲英略，翦定江淮。混一車書，

太開學校。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自參墟洛祚，重光景曜，大宏文德，道冠前王，邁軸之士風趨，林壑之賓雲集。故能抑揚漢徵，孕育曹丕，文雅鬱興，于茲為盛。……因請法師暫回清鑒，採摭詞實，耘剪繁蕪。

這說明慧淨所選起自北朝的周，南朝的梁陳。《唐音癸簽》說明此書所輯為「自梁至唐初劉孝孫」，是不錯的（胡震亨所謂至劉孝孫止，也根據此篇序文末所云「予聊因暇日，敬述芳猷，俾郢唱楚謠，同管弦而播響」）。

由於這個選集已經亡佚，前代文獻記載缺乏，我們未能知道選目的詳細情況。但從以上所引，可知慧淨與劉孝孫對於建安至齊梁的詩人，所看重的還是一些寫景抒情之作，對建安文學的意義，對齊梁文風的柔弱，缺乏認識，又加以貞觀前期詩歌還仍沿六朝餘波，因此他們認為唐初詩歌只不過是北朝溫（子升）、邢（邵），南朝徐（陵）、庾（信）的繼續，他們看不出新朝在文學上有什麼變化，因此將唐初詩歌與周、梁時合編，在他們看來自是順理成章的事。

劉孝孫雖然參加了唐太宗的文學館，但他對前代詩歌的發展衍變，以及新時期詩風應當具有什麼新的特點，似都缺乏認識。慧淨得名於隋朝，作為一個僧人，又囿于教義，他當然更不瞭解大唐帝國的建立會對文學發展具有怎樣的意義。他們的識見都落後於當時參與修史的大臣如魏徵、李百藥、令狐德棻等。唐朝建立之初，即命朝臣修梁、陳、北齊、北周、隋史，貞觀三年（六二九），唐太宗下令由魏徵

總其成，加快修史的進度。貞觀十年（六三六）五史相繼完成。他們修史的時間與慧淨、劉孝孫討論、編撰選詩的時間是相近的。而魏徵等却明確地提出了新建立的王朝對前朝文學提綱挈領式的看法。他們也肯定齊、梁時文人在藝術技巧方面的探討和成績，如說江淹、沈約等「縟彩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隋書·文學傳序》）；又說徐陵「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陳書·徐陵傳》）。但在總體上，也就是詩歌的發展方向上，他們是予以否定的，並且指出這種文風對於國家政權的危害：「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德，蓋亦亡國之音乎！」（《隋書·文學傳序》）爲適應統一大帝國的建立，他們要求有這樣的一種文風，即取江左清綺，河朔剛貞，「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同上）當然，這在當時只能是一種理想提出，文學創作的實際遠未具備這樣的條件，但畢竟發展的方向已經概括地、明確地指出。劉孝孫、慧淨反映的是當時一般文士的認識，也與當時詩歌創作的實際相適應。他們與殷璠，處於極不相同的文學環境，以至幾乎無法加以比較。

過了三、四十年，即唐高宗、武則天時期，我們看到另一種唐詩選本的出現，這就是元思敬的《古今詩人秀句》。

《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文苑傳》上《德行功傳》後附記元思敬事，謂：「元思敬者，總章中爲協律郎，

預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兩卷，傳於世。《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丁部集錄，載高宗、武后時期朝臣所修的大型類書、總集，有許敬宗、劉伯莊等《文館詞林》一千卷，《麗正文苑》二十卷，另有《芳林要覽》三百卷，參預編纂者許敬章、顧胤、許圜師、上官儀、楊思儉、孟利貞、姚臻、竇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新唐書·藝文志》同卷並載元思敬《詩人秀句》二卷。

元思敬的其他事迹未詳。《全唐詩》、《全唐文》都未曾收錄其文。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二)第二章《詩的對偶及作法》曾疑元思敬即元兢。按羅說是。據《說文》，兢，敬也。元兢，字思敬，名與字正合。《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類引「或曰論秀句一段，羅根澤謂即其《古今詩人秀句》序。這段文中說及參預修纂《芳林要覽》，時與事都與《舊唐書》所載元思敬事相合。④

按《古今詩人秀句》一書已佚。據日本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第一章《成立考》⑤，元兢此書曾著錄於《見在書目》中的總集類，載爲二卷。《見在書目》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編於日本陽成天皇、宇多天皇年間（公元八七六——八九八，即唐僖宗乾符三年——唐昭宗光化元年）。則元兢此書大約也是中唐時流傳到日本去的。據《文鏡秘府論》南卷所載序，稱「時歷十代，人將四百，自古詩爲始，至上官儀爲終」，則似乎上溯兩漢。序中又云：

余以龍朔元年爲周王府參軍，與文學劉楨之、典籤范履冰書，東閣已建，斯竟撰成此錄。王家書既多缺，私室集更難求，所以遂歷十年，未終兩卷。今剪《芳林要覽》，討論諸集，人欲天從，果諧

宿志。常與諸學者覽小謝詩，見和宋記室省中，銓其秀句。……

元兢總章中爲協律郎，總章爲公元六六八——六七〇年。又於龍朔元年爲周王府參軍，龍朔元年爲六六一年。又據《舊唐書》卷七《中宗紀》，中宗李顯，顯慶元年（六五六）十一月生，「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儀鳳二年徙封英王」。儀鳳二年爲六七七年。則李顯封周王在六五七——六七七的二十年間。《古今詩人秀句》序謂兢撰此書歷十年之久尚未終二卷，乃因爲「王家書既多缺，私室集更難求」，後因預修《芳林要覽》，又得與諸學士討論，「果諧宿志」。則此書之編撰爲元兢在周王府參軍時，同時又參預編修《芳林要覽》，則兢當以協律郎又兼在周王府供職。又據《舊唐書》卷八〇《上官儀傳》，上官儀之子庭芝亦「歷位周王府屬」，可能與元兢同僚。《文鏡秘府論》天卷「調聲」引「元氏曰」，曾載元兢《蓬州野望》詩，爲《全唐詩》未收者：「飄飄宕渠域，曠望蜀門隈。水共三巴遠，山隨八陣開。橋形疑漢接，石勢似烟回。欲下他鄉淚，猿聲幾處催」。蓬州在今四川省林溪流域一帶。不知元兢因何而貶，也未知貶在何年。據《文鏡秘府論》所引，他尚著有《詩髓腦》一書，已散佚。在上述所引《詩人秀句序》的一段文字之前，已稱「皇朝學士褚亮，貞觀中奉敕與諸學士撰古文章巧言語」，後又說「銓其秀句」，似所選並非全篇，像《芳林要覽》那樣，都是摘抄佳句。《玉海》卷五四載《瑤山玉彩》一書的編撰：「龍朔元年，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圜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卽文思殿，採摘古人文章英詞麗句，以類相從，號《瑤山玉彩》，凡五百篇。」可見採摘古今詩文中的「英詞麗句」，乃是當時的風氣，也是繼《藝

文類聚」而來的把詩歌創作看成事類堆砌的一種作法。聞一多《類書與詩》（載《唐詩雜論》中）曾列舉唐初五十年間大量編修類書的情況，說：「假如選出五種書，把它們排成下面這樣的次第：《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家的詩集，我們便看出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序中的幾個階段。」因此他曾形象地比喻說：「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較粗糙的詩，他們的詩是較精密的類書。」

元兢（思敬）所參預編修的《芳林要覽》也就是這樣的把詩歌的創作與類書的編纂結合起來的工作，而歸結點則是在追求詞藻的彫飾。《芳林要覽》的修纂者有上官儀，而《古今詩人秀句》在唐人的終點又是上官儀，就可見元兢的審美追求是怎樣反映高宗前期的文學環境——那正是「四傑」已經登上詩壇，陳子昂還未出場，上官儀的綺靡錯媚的詩風正瀰漫於一時的文苑。楊炯《王勃集序》曾對那一時期上官體文風作過描畫：

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粲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文苑英華》卷六九九）

不過，我們還應注意到的是，元兢序中稱他選詩的宗旨是：「以情緒爲先，其直置爲本，以物色留後，綺錯爲末，助之以質氣，潤之以流華。」元兢這裏提到選詩以情緒爲先，雖然他沒有具體闡述這個「情緒」究竟是什麼，但終究接觸到了詩歌創作的一些本質方面的東西。我們知道，陸機《文賦》是很重視情對於文學、特別對於詩歌創作的重要作用的，他在論述詩、賦、碑、誄、銘、箴、頌、論等文體時，特別提

出「詩緣情而綺靡」；在論到創作過程時，講到感興，也即是創作靈感、想象問題時說：「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驚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隨曠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指出在創作過程中，物象的清晰，是與作者主觀情緒越來越鮮明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而當與會過去時，則先是「六情底滯，志往神留」，於是就「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元兢沒有像陸機那樣作細致的分析，但他概括地提出「以情緒爲先」，並說「其直置爲本」，雖然還失之籠統，但這與當時一味追求藻飾、失去真情的臺閣體詩已有所區別。而且他還提出「質氣」這一概念，這也是難能可貴的。不過他仍然把「質氣」放在輔助的地位（「助之以質氣」），這比起當時王勃所要求的「氣凌雲漢，字挾風霜」（王勃《平臺秘略贊·藝文》）和「思飛情逸」、「興洽神清」（《山亭思友人序》）的詩風來，不免稍遜，比起後來殷璠在《河岳英靈集》中明確提出的「興象」、「氣骨」等概念來，就更有一段距離。但我們由此也可看出唐代詩選家漸進的痕迹。

這裏我們連類而及地介紹一下李康成的《玉臺後集》，因爲據《唐音癸籤》，《玉臺後集》也是「唐人選唐詩，其合前代選者」的一種，雖然編選者李康成的時代已晚，與殷璠同時，都是天寶時人。

《新唐書·藝文志》丁部集錄載李康《玉臺後集》十卷，無「成」字，對其生平一無說明。後世有關李康成的記載，都是根據南宋劉克莊的《後村詩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七《詩話續集》：